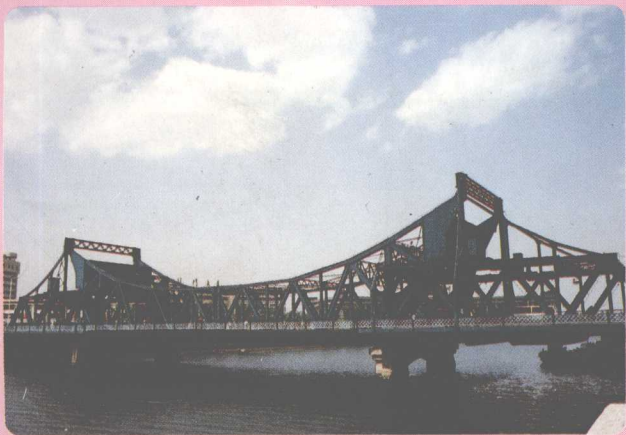


95. 1

(总第六十五辑)



要

●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成长

●宋哲元自纪

●台籍抗日将领黄国书

●金家当铺始末

目

●内蒙古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回忆

天津文史资料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(津)新登字 001 号

执行编辑:张笑平

版面编辑:康明

校对:张玉芳

张敦书(特邀)

天津文史资料选辑

1995·1(总第六十五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.25 印张 156 千字
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ISBN7-201-02263-6/K·292

定价:4.50 元

抗 战 风 云

- 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成长…………… 姜凝先(1)
- 台籍抗日将领黄国书…………… 郑 平(17)
- 冀中抗日斗争片断…………… 张 猛(25)
- 北上先锋部队首次挺进武清纪实…………… 杨 平(36)
- 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…………… 傅二虞(42)
- 中条山战役后的天津俘虏收容所…………… 马友欣(45)
- 天津沦陷前最后一刻我撤出的经过…………… 赵继曾(52)
- 被逼参加“勤劳奉任”的回忆…………… 张国贤(58)
- 卢沟桥事变后的天津抗战…………… 常 凯(6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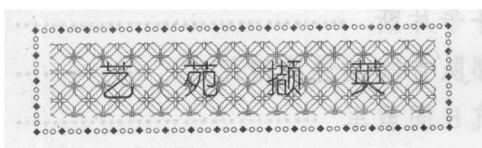
往 事 追 忆

- 内蒙古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回忆…………… 陈 卓(69)
- 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…………… 佘铁隽(79)

- 宋哲元自纪 宋哲元(84)
 宋哲元将军轶事..... 李惠兰(94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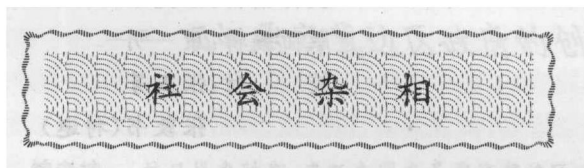
- 著名教育家魏元光事略 王家琦(99)
 王开治轶事 王复礼(113)
 杨十三与苇草造纸 王家琦(119)



- 魏联升小传 甄光俊(124)
 孟广慧事略 孟昭联(134)
 津沽民族音乐家刘楚青 陈嘉瑞(140)



- 忆上海银行天津分行 朱继珊(155)
 金家当铺始末 金继光(168)



天津水会的创立与解体

- 杨桂山 · 李洁贤 于昭熙(176)
老天津的杠房..... 于昭熙(184)
天津济良所..... 金大扬(187)



天津中医医学教育家——陈泽东

- 王士相 张玉泰(118)
丁伯钰糖堆..... 王寿岩(16)

《天津文史资料选辑》61辑——65辑目录索引

- (191)

封面照片说明 (98)

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成长

——回忆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创立

编者按：抗日战争时期，姜毅先同志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的秘书长，又是山西“牺盟会”的特派员。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，他兢兢业业，艰辛工作，全心全意为边区人民服务，为创建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解放后，很多在边区工作过的老同志见到他时，仍热情地称呼他为“秘书长”。他生前也多次提到：“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，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事。”1984年他不幸病逝，至今已整整十年。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中，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张洪祥先生曾多次访问过他，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，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，并缅怀姜毅先同志。张洪祥教授将多次访问的记录，整理成此文。公诸于世，以饬读者。

抗日战争爆发以前，日本帝国主义已进攻绥远，策动华北事变，山西形势非常紧张。当时我在山西“牺盟会”总会工作。“牺盟会”全称叫牺牲救国同盟会，创立于1936年9月，是我党在山西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群众革命组织。名义上，会长是阎锡山，实际上是由中共北方局薄一波同志负责领导。牺盟会基层组织遍布于山西全省，大约有近百万的会员。牺盟会的主要任务，是发动群众组织训练队伍，进行抗日救亡活动。所以会员绝大多数是爱国青年和抗

日救亡的积极分子。我在总会宣传部工作，领导人是宋劭文同志（地下党员）。30年代初他是北大的学生，我也是北大的学生，彼此比较熟悉，尤其在一个部门工作时，关系更加密切。当时裴丽生、傅雨田、侯振亚等同志和我都在一起工作。开始我们的任务是：组织指导民间文艺团体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，并负责编写出版《牺牲救国》周刊和各种宣传抗日的资料。后来，牺盟会组织抗日武装——即抗日决死队时，我们宣传工作的重点也转向了学校和广大农村，号召全民总动员，抗日救国，协助组织部门开展抗日武装的军政训练工作。

1937年8、9月间，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山西北部重镇阳高、大同，随后又兵分三路向太原进攻。这时，晋东北形势已一片混乱，国民党军队（包括阎锡山的晋军）全面溃退，各县县长也都弃城逃跑，散兵流匪乘机抢劫财物，奸污妇女，无恶不作，扰害至极。在国民党军队向南逃跑之时，我八路军主力三个师在朱总司令指挥下，东渡黄河，挺进山西，开赴抗日前线。当时八路军总部，就设在五台县南茹村，115师和129师分别驻扎在东冶、河东、豆村、蒋坊等地，开创了山西抗战的新局面。当时，阎锡山为了保持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，特起用牺盟会组织的新军（即抗日决死队）开赴晋东北抗战；同时委任宋劭文为五台县县长、胡仁奎为孟县县长、李仲甫为定襄县县长等，要求立即走马上任。宋知道八路军总部和薄一波率领的新军都已赶进晋东北地区，去五台上任是同我党直接联系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最好机会。他接受了委任，很快离开太原赴五台。在临行之前，找我谈话说：“我去五台要带走几个干部，你文笔很好，又有群众工作经验，对山西的情况也比较熟悉，我已同总会（指牺盟会）商量好，调你同我一起去五台工作，不知你有什么意见？”我说：“没有意见，只要抗战需要，到哪儿工作都行。”那时，我还年青，无牵无挂，听说去抗战前线工作，热情非常高。就这样，9月20日宋劭文和我一起赴五台县上任了。同去五台的还有高晋才、蒋自力、李杰

云等几个干部。后来，宋劭文和我到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时，五台县长就由蒋自力同志接任，高晋才同志任五台县的会计。

五台县是阎锡山的老家，当地的大地主都是阎的家族和亲戚，封建势力很大。五台县境内的五台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，周围有300多座庙宇，每座庙宇都拥有大片耕地，出租给当地农民耕种。当地庙宇分青庙和黄庙两种，青庙是和尚庙，黄庙是喇嘛庙。大和尚、大喇嘛，就是当地的封建大地主。他们除了收租、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外，对佃户之妻还享有“住夜权”。这是非常野蛮的制度。当地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压在我们身上有两座大山，一是阎锡山，二是五台山。”如何处理好这两大封建势力？是我们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所面临的重要问题。另外，五台县还是牺盟会晋东北中心区的所在地，这里抗日救亡的宣传、组织工作都做得比较好，广大群众抗日情绪非常高涨。记得我们到五台县的第二天，县城各界群众敲锣打鼓，吹奏锁呐，打着“欢迎抗日县长上任”的横幅标语，到县城南门河迎接我们。因为那时候，日本侵略军每攻占一地，实行法西斯的野蛮政策，烧杀掠夺，强奸妇女，无恶不作，群众非常害怕；加上晋东北各县官吏纷纷逃离，群众更是惶恐不安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我们鼓足勇气上任，对鼓舞士气、安定民心、维持社会治安，有着重要意义。第二天，宋劭文同志就在县府主持召开工作会议，规定原县政府人员一律参加。他讲话的精神是：（一）原政府人员，除县长和部分科长有变动外，其他人员一律留用，照旧工作。（二）当前中心工作，发动群众，组织抗日救亡团体，掀起抗日高潮。（三）现在是大敌当前，从县长、科长到办事人员，一律坚守岗位，同全县民众一起抗战到底，“誓与五台人民共存亡！”当时，我们从太原来的几位同志，也都在会上表示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。我们的行动受到全县民众的拥护和支持。

因为五台山的和尚、喇嘛势力很大，历来受到官府的支持和保护。所以过去每个县长上任，都必须首先拜访大喇嘛，否则“乌纱

帽”就保不住。宋劭文上任，没有去拜访，这是个破例。但是为了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，团结僧侣共同抗日，后来还是派我作为代表，去五台山慰问全体僧侣，宣传抗日救亡思想。

我到五台以后，开始担任县政府秘书工作，实际上是宋劭文的助手，什么事情都管。上面的、下面的，各部门要办的事情，都首先归到我这个口。能办的事，我就决定了；重要问题，我都向宋劭文同志汇报，请他决定。开始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县财政空虚，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而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一批又一批国民党军队，路过五台县就到县政府要钱、要粮、要牲口、要车辆。不答应他们的要求，他们就大闹县政府，公开抢劫机关和百姓的财物。政府机关已不能正常办公，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。有一次，县里来了一批溃军，要县政府立即征调驮骡六七千头，限期完成。宋劭文说：本县驮骡都已被撤退的军队全拉走了，我有天大的本领，也无法办到。事后，宋劭文要我立即给省政府打报告，第一，如实反映溃军纪律败坏、沿途抢劫骚扰情况，要求上级下令约束部队。第二，要求省政府拨给经费，以解决部队的给养和地方的开支。第三，要求省政府出面，督促各部队，把抢去的车骡放还回来。这份报告送上后，还是起到了一点作用，阎锡山派人给我们送来几万两大烟土，让我们变卖当经费使用。当时八路军供给非常困难，没有粮食、没有衣服，五台山地区是高寒地带，气候很冷，但广大指战员仍穿着单衣，光着脚，或穿双草鞋，苦不堪言。我们就把烟土变卖了七八万元，全部供给八路军以解决部队给养问题。当时薄一波同志在五台山，听说溃军骚扰五台县城，为了保护县政府，维持地方治安，他派出抗日决死队第一个纵队的兵力，从台怀镇（即五台山，薄一波领导的决死队第一纵队驻扎在这里）开到五台县城。从此，县政府门口设立了岗哨，才挡住了那些溃军的骚扰。

太原沦陷前夕，阎锡山把山西全省划了7个行政区，设立7个政治主任公署。晋东北地区为第一行政区，包括五台、盂县、定襄、

寿阳、繁峙、忻县、崞县、代县、阳曲、灵丘、浑源、山阴等 18 个县，委任宋劭文为行政区政治主任兼五台县长，公署设在五台县。我的工作，同样也变成了政治主任公署的秘书兼五台县的秘书。记得命令下达后，宋劭文立即派我去太原办理接受委任状、关防、电台等事宜。我到省政府时，看到的是一片狼藉，各机关正忙着搬家，向临汾撤退。阎锡山已先头到达临汾，接待我的是省主席赵戴文。他告诉我说：“太原是守不住了，今后省内已不能同你们直接联系了。请转告宋主任，以后晋东北地区一切事务由他全权处理，不必更番请示，这是阎长官（指阎锡山）的意见。”说完后，就把委任状和晋东北 18 个县的大印交给我；同时还拨给一辆军用汽车、一部电台、15 支枪支和 9 箱子弹。当时忻县已被日军占领，我带了这些东西，坐汽车穿过定襄，顺利地返回五台。这 18 个县的大印是怎么搞到手的呢？当年，阎锡山有个规矩，就是县长离任（不管什么原因），都必须亲自把印章送交省政府，否则以逃离职守论处。所以各县县长逃离时，都把大印封好，送到省政府，这样便可换取“正常离任”的说法。这 18 个大印还是很起作用的，后来宋劭文以此任命了牺盟会干部于寿康、杜向光、赵鹏飞、苏应明等十多位同志为各县县长，使晋东北 18 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，为晋察冀边区的成立奠定了基础。

二

平型关战役以后，大约在 1937 年 10 月下旬，八路军总部及所辖的主力部队，奉命撤离五台，转战晋东南战场。在这以前，薄一波领导的新军，已全部开赴太行山，为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作准备。主力部队撤离以前，中央决定留下 115 师政委兼副师长聂荣臻同志以及一个师独立团（杨成武指挥）、一个骑兵营（刘云彪率领）、师教导队的两个队、特务团的两个连和部分政工干部，约 2000 余

人，留守五台，建立抗日根据地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。

“晋察冀”作为一个行政区，开始没有这个名字，是后来逐渐明确叫起来的。聂荣臻同志接受任务后，就率领这2000余人，以五台山为基地，分兵向察南和冀西发展，先后收复冀西、察南20余县，建立了敌后抗日民主政权，加上晋东北10余县，使晋察冀三省边陲地区连成了一片。1937年11月7日，在太原失守前一天，聂荣臻同志在五台正式宣布成立了晋察冀军区，从此，“晋察冀边区”的名字见诸于国内各大报纸，开始叫响了。

关于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，最早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提出的。大约在10月下旬，他给聂荣臻一份电报，主要内容是：要求立即着手筹备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，主席可由宋劭文担任，以加强与统一全区的军政领导等。同时电报还指示，边区政府一面筹备成立，一面向蒋介石、阎锡山提出，力求取得他们的同意后，向全国公开，以便推广到其他边区。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，聂荣臻同志首先找宋劭文同志商量建立边区政权事宜。然后在五台石嘴村普济寺（军区司令部所在地），聂荣臻同志曾主持召开过一次小型会议，记得宋劭文和我，还有孟县胡仁奎县长、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、《抗敌报》社邓拓等都参加了会议，中心议题就是筹备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有关事宜。这次会议决定了以下几项工作：（一）由宋劭文牵头，成立筹备委员会，成员要有晋察冀三省的代表性人物，由委员会着手起草宣言、政府组织大纲、施政纲领等文件。（二）要联络各县、各抗日团体选派代表，召开一次军政民代表大会，选举产生边区政府。（三）冀西、冀中抗日局面已经打开，阜平完全在我们手中，又是三省边界的中心，晋察冀省委已在阜平成立，军区也即将迁往阜平，边区政府可择日在阜平成立。（四）由宋劭文起草报告，送交阎锡山并转国民政府，争取他们能同意，取得“合法”政府的地位，以利于民众发展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这次会后，军区机关迁驻阜平境内。宋劭文和我回到县城，第一件

事就是给阎锡山打电报，说明华北沦陷后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蓬勃发展，各地都先后建立了抗日政权，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边区政权，要求阎和国民党政府能予以批准。当时，我们有一部电台，同阎锡山一直保持着联系。我们一连发去7份电报，阎锡山都不作答复。后来是胡仁奎出了个主意，把电报内容给修改一下，专门讲新成立边区政府对阎锡山的好处，而且政府成员大部分是阎锡山派来的人，并附上成员的名单：

宋劭文	山西省第一行政区政治主任兼五台县长
胡仁奎	山西省盂县县长
刘奠基	太原绥靖公署参事
姜凝先	山西省第一行政公署秘书
李杰庸	山西省政府秘书
聂荣臻	晋察冀军区司令员、八路军代表
张 苏	蔚县县长、察哈尔省代表
吕正操	东北军五十三军团长、河北省代表
孙志远	保定行营民训处特派员、河北省代表

以上名单是经过聂荣臻同意批准的，把山西方面的代表列上5名，而且大部分是牺盟会的负责人，是为了争取阎锡山的同意。这份电报发出后，果然阎锡山很快复电表示同意，只是在名单上把我的头衔给改了，划掉了公署秘书，改为“牺盟会特派员”。我这个“特派员”的称号，就是这么得来的。阎锡山的目的是把职务提高一下，往国民政府呈报，容易得到批准。其实“特派员”，不是一个正式、固定的职务，当时牺盟会派出的特派员很多，一般县是一名，大县派两名，只是相当于县长或专员的级别而已。谁能想到，30年后的文革中，“特派员”竟成为造反派整我的一大罪状。我记得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，阎锡山转来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复电，内容大致是这样的：所请成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该会组织人选，均照准。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着归阎司令长官指挥，特电遵照。

说明国民党政府正式批准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。后来，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，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政策，阎锡山后悔地说“我上了宋劭文的当！”在敌后 10 多个抗日根据地中，晋察冀边区政府是唯一得到国民政府批准承认的，取得了合法地位。后来其他地区抗日政府的成立，国民政府再也不批准了。

军政民代表大会能在阜平召开，张苏同志是立了大功的。他原名张希贤，察哈尔人，抗战以前在蔚县当过教育局长，领导过学生运动，是蔚县建党的领导人之一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在太原，见到过周恩来同志。那时国共合作已正式形成，经周推荐，被第二战区委任为蔚县县长。由于雁北、忻口失守，张苏无法赴任。后被我党派到阜平县担任了抗日政府的县长。军政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后，他就是这个县的县长。他有领导才能，工作有魄力，行政管理能力也很强，所以他主动要求承担大会和边区政府的筹备工作。当时阜平是冀西山区的一个小县，物质条件较差。张苏想方设法把县城机关、团体、学校都动员起来，接待各地来的代表。会场就设在县城的一所小学教室里。记得会场里有两条大标语很醒目：一条是“一切为了抗日战争”，另一条是“民主之光”。各地来的代表共 140 多名，来自晋察冀三省各抗日部队、各群众团体、各县政权选派的代表，还有蒙、回、藏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。他们分别住在机关、学校和附近喇嘛庙里。当时正是冬天，气候寒冷，没有取暖设备，但是代表们抗日情绪很高，军区派出了很多干部和战士接待他们，为大会服务。由于张苏同志细心安排，克服各种困难，使大会顺利地完成任务。

三

新成立的晋察冀边区政府，相当于省一级的政府机构，开始酝

酿设厅，后改为设秘书、民政、财政、教育、实业、司法等六处，以后又陆续成立了银行、贸易局、公安局、农林局、工矿局、粮食局等。分工情况是这样的：宋劭文任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财政处长、胡仁奎任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兼民政处长、娄凝先任政府委员兼秘书长、张苏任政府委员兼实业处长、刘奠基任政府委员兼教育处长、王斐然任政府候补委员兼司法处长等。以上几人主持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。另外，政府委员还有聂荣臻、吕正操、孙志远等，他们主持军队工作，随军区活动不在政府办公。李杰庸也是政府委员，边区政府成立后，被调到冀中行政主任公署任主任。军政民代表大会，除了选出我们9人为政府委员外，还选出王斐然、张仲翰、孟阁臣等3人为政府候补委员。他们三个人的情况是这样的：王斐然，河北人，早年在京东地区领导过农民运动，担任过县长。抗战后，他参加了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的工作，是冀省方面的代表，为联络河北各地党政军和各社会团体，参加军政民代表大会作了大量工作，故被选为政府候补委员。王斐然后来担任了边区最高法院院长，是边区司法工作的奠基人。张仲翰，献县人，抗战以前，担任过博野县警察局长、县长等职。抗战爆发后，他组织河北民军，任司令，进行抗日活动。后来他又组织领导津南人民抗日自卫军的活动，在冀中社会名声很大。经吕正操同志推荐，被选为区政府候补委员。孟阁臣，原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，担任过连长。抗战爆发后，他在易县、满城、徐水一带打着“抗日”的旗号，搜罗散兵游勇和当地土匪，拉起一支七八千人的队伍，自称“七路军”司令，在当地称王称霸。晋察冀军区成立时，为了团结各抗日部队共同抗战，曾派人联络孟阁臣，他表示服从军区统一领导，“拥护八路军”等，所以军区曾委任他为易、满、徐军分区司令，并选他为边区政府候补委员。但是他阳一套，阴一套，旧习不改，专门鱼肉百姓，拒不执行军区和边区政府的命令，在所控制的地区勾结日军，迫害我军政干部，破坏抗战，结果被军区依法处决。

从以上 9 名政府委员和 3 名候补委员的政治面貌来看，除了孟阁臣是混入革命队伍的被清除外，其他 11 人中有共产党员、国民党员、牺盟会成员、东北军军官、抗日县长、抗日部队的领导人等等，说明边区政府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。但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是聂荣臻和张苏两人；而宋劭文、胡仁奎、吕正操、孙志远、王斐然、张仲翰、李杰庸和我都是秘密党员。不仅阎锡山不知道，就连我们内部的人，也不完全知道，因为秘密党员都是单线联系的。如胡仁奎在抗战时期一直是以“国民党员”身份出现的，直到全国解放，他才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。正因为通过这些党员去工作，才保证了我们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。

军政民代表大会开得非常成功。会议充分发扬民主，代表们认真讨论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，参政议政的意识很强。我记得在讨论贯彻减租减息政策时，会上发生了一些争论。五台、阜平、繁峙等县的部分农会代表，认为五台山的和尚、喇嘛拥有大量土地，是封建大地主，说他们“除了烧香念佛，别无他事，对抗战毫无帮助”等等，主张对他们的租额要多减些，以改善贫苦佃农的生活。农会代表发言后，五台山的蒙藏同乡会以及和尚、喇嘛代表立即反驳，不同意上述主张。他们说：我们是出家人，但出家不出国，我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，也积极努力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。为什么对别人少减地租，而对寺庙要多减地租？会上很多同志对他们的发言表示同情和支持。当时黄敬、宋劭文、邓拓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赞同和尚、喇嘛代表的意见，指出要正确对待和尚、喇嘛，这是涉及到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问题。在执行政策上，应该一视同仁，不分彼此。他们还列举了抗战以来五台山寺院对抗日部队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，耐心地说服了农会代表，统一了思想认识。会后，和尚、喇嘛的抗日救国积极性更高，他们组织了“五台佛教救国同盟会”（成立时有 60 多名代表，包括青庙、黄庙的僧人），并举办了蒙、藏同胞训练班，和尚、喇嘛训练班等，以提高蒙、藏同胞和和尚、喇嘛对抗战形

势的认识，增强爱国主义精神。当时这项工作主要由民政处管，他们派人去主持训练工作。因为我是边区政府秘书长，所以有关民族、宗教方面的抗战活动也向我汇报。我记得当时训练班讲授的主要内容有：日本侵华政策、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、中国抗战的形势与前途、东北沦陷后的情况、汉、满蒙、回、藏之间的民族关系等等。经过训练的学员，后来都分赴蒙、藏各地开展抗日活动。

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，工作是千头万绪的，但是首要任务是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。当时边区脱产的军政人员达万余人，吃饭、穿衣、武器弹药的供给以及其他行政费用的开支等等，都急需新政府来解决。据统计，仅军费一项开支，每月就需要70余万元（法币）。另外，边区兴办的军用和民用工业需要投资；商业要资金，农业要贷款，灾民要救济等等，都需要钱花。新政府本身没有钱。虽然边区政府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，但中央政府从来不给经济上的支持。所以当时边区政府确定的方针是：一切从抗战出发，立足于自力更生，整顿财政，开源节流，发展生产，改善民生，保障抗日部队的供给。我要说明一点，我们边区有很多能人，中共北方分局的彭真同志亲自抓财政经济工作，宋劭文、黄敬、胡仁奎、张苏等都有管理经济工作的经验，善于理财，对解决边区财政问题充满信心。他们曾提出建立边区银行、发行边币、发行救国公债、恢复田赋、征收公粮、征收营业税等建议，得到了军政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一致拥护。边区银行是1938年3月成立的，行址设在五台县石嘴村的普济寺，行长是关学文同志。他原来是东北军吕正操部队的军需处长，也是一位善于理财的能手，经吕正操同志推荐，担任了行长职务。副行长是胡作宾同志，他是山西定襄县人，抗战前任过山西省铁路银行郑州办事处主任，对银行业务比较熟悉。边币发行的准备金很有限，最初定为50万元，实际上只有聂荣臻同志从八路军军饷中节留下的4万元法币，吕正操同志打下安国县城所缴获的3万元法币，再加上实物（粮食和棉花）作为准备金，就开始发行边

币。最初发行的是1元、5角、2角等几种边币，由于群众不了解，加上边币纸张不好(大本纸)，大家不信任，流通后，群众又很快到银行兑换法币。后来杨成武同志消灭了叛军孟阁臣，搞到一大批黄金(元宝)、铜元和现钞，把这些都运到了边区银行，并在银行展览，让群众参观，从此树立了银行威信，边币也稳定了。所发行的边币，一部分用于解决抗日部队的供给；另一部分则用于支持工业、商业、农业等方面的建设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与此同时，边区政府还向广大群众发行了200万元的救国公债，从整顿税收中(废除过去的苛捐杂税，恢复建立了入口税、屠宰税、烟酒税、印花税、棉花出境税等等)，每月可收入30至50万元，征收田赋(即土地税)其收入约占整个边区财政收入的20%左右；另外1939年开始征收救国公粮(即农业税)，为16万石小米等等。边区政府就是依靠这些粮款，保证了抗日部队、政府机关的供给和民众生活的改善，有力地支援了敌后抗日战争。征收救国公粮，我们本着“钱多多出，钱少少出”的原则，实行合理负担，照顾广大农民利益，故受到全边区农民的欢迎和支持。当时地主占有土地多，粮食收成也多，当然要多交田赋和公粮。所以少数地主意见大，叫嚷负担太重。例如阎锡山的亲戚就拒不交纳公粮，并向阎锡山告状。后来阎锡山给我们打来电报，说什么“我的几位亲戚已经没有钱粮可交了，他们应交的数目记在我的帐上吧，由我负责。”这分明是赖帐，谁敢向阎锡山去讨帐。后来，我们也不客气，当时阎锡山的管家叫裴斌丞，住在五台县，他手上保存了阎一万多元现金，我们以政府财政困难，硬把这笔款“借”来了，充实抗经费。1941年边区政府对税制又作了重大改革，实行统一累进税，把田赋、公粮和其他杂税合并为一项税，然后按每户财产、收入多少，划成若干等级，按等级纳税。这样，民众负担更加公平合理，同时又增加了边区财政收入。1939年初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所取得的成绩，誉为“抗日模范根据地”。